

## 談《台北人》中白先勇之悲感

張家威<sup>1</sup>

### 摘 要

本文將概述《台北人》一書的經典研究方向，並嘗試提出一個新的解讀方向，接著取書中的〈永遠的尹雪艷〉〈花橋榮記〉〈國葬〉三篇文來分析、檢驗。

在臺灣文學史上，白先勇的小說多被放在「六〇年代現代主義文學」篇章下進行論述，這點應是無庸置疑；不過，在閱讀《台北人》和作者的生平事蹟時，不時會瞥見「存在主義」的影子，這也讓筆者好奇，產生了一個基本假設：「白先勇的現代主義文學，是植基於他的存在主義世界觀，且其作品《台北人》的篇章進展，和作者心境的發展相輔相成」。本文將透過故事走向、作者心境的討論，來分析檢驗這一基本假設，並探尋《台北人》中白先勇之悲感的來源。

**關鍵詞：**《台北人》、〈永遠的尹雪艷〉、〈花橋榮記〉、〈國葬〉、白先勇、存在主義

---

<sup>1</sup> 作者清華大學，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20 級，學號 105033244。

## 一、前言

在本學期閱讀的文本之中，有兩位作家的作品令我印象深刻，一是林海音的〈蟹殼黃〉；二是白先勇的〈花橋榮記〉。印象深刻的原因，是由於近期曾赴中國短期交流，過程中，我對大陸的人事物有了些獨特的回憶，這讓我開始對一個陌生的地方，產生了一些情感；另一方面，我們都不相識，但我們都共用一個「語言的土壤」，文本中的人物皆來自他方，後來因時勢，輾轉流離都來到了台灣，這樣的歷史特殊性，加上作者生動的文字方言運用，不僅寫出了社會眾生相，也寫出了一股很吸引人的美感，文字裡透出一種民國風範的文化魅力。

## 二、《台北人》經典研究方向

台北人由十四個短篇小說組成，寫作技巧不同，長短也相異，每篇都能獨立存在，串聯在一起效果劇增，能呈現我們所看到的社會眾生相。故其研究方向廣泛，從寫作技巧、人物分析、今昔對比、文學理論、象徵性、悲悼性、神秘性，到藝術性等，都有人分析著墨。

其中，歐陽子〈白先勇的小說世界〉<sup>2</sup>，提到《台北人》的兩大共通點，包含「他們都來自大陸、他們都有過一段難忘的過去」，還有「不同角色囊括台北社會的各個階級」。這些特性，他將之稱做表層鎖鏈，並且以此為框架，按「今昔之比」、「靈肉之爭」、「生死之謎」三節深入探索《台北人》一書十四個短篇的內層鎖鏈。

另外，還有余秋雨〈世紀性的文化鄉愁〉，他從白先勇作品的四個特色下去討論，分別對應可研究的不同範疇：「直取人生真味」（人物形象）、「隱含歷史魂魄」（歷史性）、「契入文化鄉愁」（象徵性）、「回歸藝術本位」（藝術性）。

除了對《台北人》整本書的主題探索，也還有不少人單篇的深入研究，例如，姚一葦〈談白先勇的《遊園驚夢》〉；曾若涵〈將軍之死——白先勇《國葬》中的國族符碼〉等等。

## 三、新的解讀方向

在臺灣文學史上，白先勇的小說多被放在「六〇年代現代主義文學」篇章下進行論述，這點應無庸置疑；不過，在閱讀《台北人》和作者的生平事蹟時，不時會瞥見「存在主義」的影子，這也讓筆者產生了一些好奇。

---

<sup>2</sup> 見歐陽子，〈王謝堂前的燕子：白先勇《台北人》的研析與索隱〉—〈白先勇的小說世界〉。

白先勇桂林出生，一生隨着家國烽火輾轉在南京、上海、香港、台灣和異國紐約。此種顛沛流離對人的影響，大多是隻有歷經過戰爭動亂的人才能夠體會。<sup>3</sup>

白先勇七、八歲染上了二期肺病，病中有兩件事烙印在白先勇心中：一是嘉陵江泛濫成災，白先勇握著望遠鏡，遠遠看見洪水捲走人畜，只能乾著急；二是父母在花園設宴，白先勇掀簾張望，目睹賓客雲集，不論親疏都喜氣洋洋，一霎時，一陣被人摒棄、為世所遺的悲憤兜上心頭，禁不住痛哭起來，因為這樣，白先勇日後格外體恤、矜憐周遭人物。<sup>4</sup>

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，是存在主義風行台灣的時候，無論是對情感認識的出發點，還是早期作品大部分人物的身上，都能看到白先勇身上存在主義哲學深刻的痕跡。<sup>5</sup>

許多人閱讀白先勇的作品《寂寞的十七歲》《台北人》《紐約客》和《孽子》時，直觀的感受是悲觀、宿命論、憐憫。筆者認為，一個文學作家的寫作基調，可以反映出作者的世界觀；而進一步觀其故事走向和細節安排，則有機會看出，作者在他的世界觀裡，「選擇」的面對方式（心境）。以此概念為底，筆者產生了一個基本假設：「白先勇的現代主義文學，是植基於他的存在主義世界觀，且其作品《台北人》的篇章進展，和作者心境的發展是相輔相成」。

#### 四、新的解讀分析

為了驗證上節提到的基本假設，本文主要將對《台北人》中的首篇〈永遠的尹雪艷〉、中間〈花橋榮記〉，和尾篇〈國葬〉來檢驗。在進入之前，先簡述筆者對於存在主義的認知。存在主義本身較雜亂無章，沒有一個很完整的系統和定義，有的人是有神論者；有的人是無神論者；不過，大體都有一些基本概念：

一、 世界是虛無的，世上沒有絕對的真理（或稱上帝已死<sup>6</sup>）。

<sup>3</sup> 南雲禾 Dagny，〈白先勇：我對人生懷有一分悲感〉。

<https://hk.saowen.com/a/e3c4012e78276fb071fee4de69a00808b0bd70c05f97775293a763d739c0c3fd>

<sup>4</sup> 參考翰林版，無敵高中國文 4，第五課之作者介紹。

<sup>5</sup> 同註 3，南雲禾 Dagny，〈白先勇：我對人生懷有一分悲感〉。

<sup>6</sup> 「上帝已死」是德國哲學家尼采的一句名言，此句在尼采《快樂的科學》一書中出現了三次，後來又在其名作《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》中出現。這是一個象徵的運用，用以詮釋「世界之虛無」、「沒有絕對的真理」等概念，而非字面上解讀尼采原先相信有個上帝，而後來祂死了。（部分參考維基百科「上帝已死」條目）

- 二、人命定是自由的，在這虛無、沒有絕對真理的世界，人命定是自由的<sup>7</sup>。當意識「選擇權」在自己身上以後，人們可以選擇是否活著。選擇死亡，之後就不必再做選擇，也不必再為自己身為「人」，要去處裡各種「意義」的課題煩擾；相反地選擇活著，就要先接受活著所見的種種感官事實，並接著「自由」去選擇。不過，能對自己的「自由選擇」負責任的，也只有自己。
- 三、人生是有意義的。每一天每一個當下累積的總合，就是人生的意義，而這個意義是甚麼將由自己賦予。
- 四、人終究要一死。有生必有死，這是改變不了的事實，由於時光永不休止地流逝，「世事無常」是必然的現象，也是個再正常不過的現象。

### (一) 故事走向衰亡

在〈永遠的尹雪艷〉裡，王貴生為了尹雪艷努力追求更多財富，最後因官商勾結而被槍斃；洪處長拋家棄子，答應了尹雪艷十條條件，最後一年丟官、兩年破產，到台北連個閒職都沒撈上；徐壯圖變得脾氣暴躁，搞砸家庭、工作關係，最後死於一把扁鑽。除了劇情外，作者也透過死亡的象徵寓意，來代表他對尹雪艷的設定，其一是風，風的意象虛無飄渺、輕盈，暗示像個幽靈，例如「像一毬隨風飄蕩的柳絮，腳下沒有紮根似的」、「不知什麼時候卻像一陣風一般地閃了進來」；其二是白色，在我們的文化裡，白色做為死亡之色，配著劇情的開展，明顯呼應故事走向衰亡的寓意，例如「穿著她那一身蟬翼紗的素白旗袍，一徑那麼淺淺的笑著，連眼角兒都不肯皺一下」、「天時炎熱，一個夏天，她都渾身銀白」、「像個通身銀白的女祭司，替那些作戰的人們祈禱和祭祀」。

〈花橋榮記〉裡不也是如此，李半城原本在大陸家鄉是首富，來台後被兒子拋棄，為求溫飽到處騙吃騙喝，最後在 70 歲大壽隔天自盡；秦癩子原在大陸是個三妻四妾大官，來台後成為一公務員，後來性騷擾事件被開除，最終在一颱風過後，被人從水塘撈起；盧先生更慘，痴痴等待他那大陸的未婚妻未果，積蓄被表哥騙光，耳朵被洗衣婆阿春給咬了，然後孤獨死在房中。而〈國葬〉一篇的有趣之處，在於它置於整本小說的結尾，歐陽子對此曾解釋：「如果〈永遠的尹雪艷〉是《台北人》的序言，〈國葬〉更顯而無疑的，是這本小說的結語。或許，我們甚至可以說，〈國葬〉一篇，是台北人墓碑上雕刻的志文。」<sup>8</sup>

<sup>7</sup> 「人命定是自由的」，或說「人是被判定為自由」，是法國哲學家薩特（Jean-Paul Sartre）的一句名言，此句在《存在與虛無》一書中出現。薩特認為，一個人並不是自願存在於世的，然而一旦存在，他就是自由的；但同時他要對自己所做的一切負責。（部分參考維基百科「尚-保羅·沙特」條目）

<sup>8</sup> 見歐陽子，《王謝堂前的燕子：白先勇《台北人》的研析與索隱》—〈國葬的象徵性、悲悼性與神秘性〉。

整本小說都不約而同地「走向衰亡」，不免令人揣測，是否有作者最根本的人生觀植基於其中，而筆者認為，或許可以用存在主義的思想加以解釋。關於衰亡，人終究要一死是不能改變的事實，也是件很正常的事情，但是，作者更要透過書中的人物諷刺，在走向衰亡之前，其每一天每一個當下，人們都可曾好好地活著？還是活在過往的眷戀之中？死亡是必然的，但是這些人的悲劇，卻是自找的。

## （二）寫作心境轉變

存在主義的思想，「虛無」、「死亡」的概念容易引發人們的負面感受，但它僅是個客觀的事實而已。筆者在前一節裡曾提及，許多人閱讀白先勇作品的直觀感受是「悲觀、宿命論、憐憫」；然而，如果僅僅因為這些痛苦情緒、引發消極聯想的故事走向，就簡單將他歸為悲觀主義者是表面的，「對於殘酷現實的揭示並非悲觀的表現，只有對其無動於衷才是真正的消極」<sup>9</sup>。基於此，筆者認為白先勇確實是悲憫而不悲觀的，也認為這份悲憫之心，是在纂寫《台北人》一篇篇小說之中，有了更高度地淬鍊，引述歐陽子的分析：

老和尚，到最後一篇〈國葬〉才出現，是深具含義的。這指示出《台北人》的作者自己，在寫作這本小說的過程中，心靈上的發展和轉變。我們記得，《台北人》首篇之尹雪艷，也不是凡人，也是超自然的“靈”，可是她冰冷無情，毫無慈悲心腸，所以她是死神，而非菩薩。白先勇開始寫作《台北人》的時候，心情可能就像尹雪艷，打算冷冷地，完全客觀地，高高在上而不付予絲毫感情地，寫幾個諷刺社會的小說。可是才寫完第一篇，他就已經心軟；接著一篇篇下來，在文學創作過程中，他一次又一次，隨同小說人物，在心理上親歷了他們個人的生命悲劇，終於徹悟人生是茫無邊際的苦海。如此，寫至最後一篇〈國葬〉時，作者彷彿已看破紅塵，超升解脫而變得大慈大悲。正如老和尚劉行奇，在兩半句話和幾滴眼淚裡，替芸芸眾生擔當著無限的憂苦。<sup>10</sup>

所以《台北人》一書，開篇〈永遠的尹雪艷〉，冷酷而悲觀地，呈示人類之卑微；但是到了結尾〈國葬〉，隨著作者的心境轉變，反倒溫柔而達觀地，呈示人類之尊嚴。

## 五、《台北人》中白先勇之悲感

本文透過《台北人》裡的幾篇小說，捕捉作者存在主義思想的影子，並嘗試檢驗了「白先勇的現代主義文學，是植基於他的存在主義世界觀，且其作品《台北人》的篇章

<sup>9</sup> 同註 3，南雲禾 Dagny，〈白先勇：我對人生懷有一分悲感〉。

<sup>10</sup> 見歐陽子，〈王謝堂前的燕子：白先勇《台北人》的研析與索隱——〈國葬〉的象徵性、悲悼性與神秘性〉。

進展，和作者心境的發展是相輔相成」這一基本假設。不過方法不太嚴謹，只能做為我對於非經典讀法<sup>11</sup>的一次嘗試。

儘管如此，這一研究過程仍讓我對存在主義和白先勇的關聯，有更深入的了解。引述海德格爾在《存在與時間》中所寫道：「向死而生的意義是，當你無限接近死亡，才能深切體會生的意義。」因此，「孤獨、煩惱、絕望等痛苦情緒也就被存在主義者視為人最基本的常態。當寫作的目光投向人性深處時，存在主義能夠提供的答案往往具有實用價值。」<sup>12</sup>

最後，對照白先勇所言：「雖然人生有許多痛苦，有許多不可預測而叫人遺憾的地方，但偶爾一下的喜悅，人性蹦出的一點光輝，常使我對人性肯定，使我對人性有信心，雖然人也有恐怖的一面，但人也有所以為人的尊嚴。我想我不是悲觀，而是對人生懷有一份悲感，這也使我對人性更加珍惜。」有了這次研究，可以更加明白，《台北人》中白先勇之悲感；而這同時，也就是我們在閱讀《台北人》的時候，所感受到的那獨特美感。

---

<sup>11</sup> 本報告的指定大方向為，「選擇一台灣文學經典作品，提出此作家與此文本目前的解讀方向，並提出全新的文本解讀方向（即非經典讀法）」。

<sup>12</sup> 同註 3，南雲禾 Dagny，〈白先勇：我對人生懷有一分悲感〉。